



经典影像丛书
颜子悦 主编

受难中的激情

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

〔美〕吉恩·德拉姆 戴尔·德拉姆 著
吉晓倩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受难中的激情

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

〔美〕吉恩·德拉姆 戴尔·德拉姆 著
吉晓倩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受难中的激情: 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 / (美) 德拉姆 (Drum,J.), (美) 德拉姆 (Drum,D.) 著; 吉晓倩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399-4011-3

I. ①受… II. ①德… ②德… ③吉… III. ①德莱叶, C. T. (1889~1968)
— 传记 IV. ① K835.34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8438 号

MY ONLY GREAT PASSION

The Life and Films of Carl Th. Dreyer

by Jean Drum & Dale D. Drum

Copyright © 2000 by Scarecrow Pres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Published by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5-310

书 名 受难中的激情: 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
著 者 (美) 德拉姆 (Drum,J.) (美) 德拉姆 (Drum,D.)
译 者 吉晓倩
责任编辑 孙金荣
责任校对 薛 良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11-3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关于卡尔·德莱叶的出版物屈指可数，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人深藏若虚的个性相吻合。在一个自命不凡、把曝光视为生活方式的圈子里，卡尔·德莱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隐私程度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总是对采访者彬彬有礼，德莱叶却从未渴望自己像名流一样尽人皆知，他告诉人们，如果了解他，应该去看他的影片。他简简单单地说，他就是他的电影。他是丹麦人，这个小国的本分的人民历来无意在世界舞台上兴风作浪。这一点加剧了他的默默无闻。尽管他的电影生涯跨越了五十余年——伴随着电影业的诞生与成长——他仅仅拍摄了十四部影片，其中还有九部是默片，这使得他很容易受到忽视。然而，毫无疑问，卡尔·德莱叶是电影艺术的伟大天才之一，如果缺乏对这个人及其影片的深入理解，任何电影史都是不完整的。

在任何历史性著作中，最直接、最根本的问题都是所呈现的材料是否确凿可信。我们自始至终都牢记这一点，并会指出任何由于任何原因而导致的资料不确定之处。不过，我们认为，本书的读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样他们不仅能够更明白哪些资料的可靠性有限，而且能够理解何以如此。此外，我们为本书搜集资料时的经历也令我们萌生感激之情，我们觉得，对那些惠赐助力的人士，普通的、正式的、通常也是机械的致谢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真情。于是，我们尝试在前言中对我们的研究经历做更为个人化的细致描述。这一方面是为了告诉读者资料的来源及其可信度，另一方面也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对那些拨冗相助的人士的感激。没有来自下文所讲述的那些人士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在1964年德莱叶七十五岁寿诞之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祝词引导我们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们对德莱叶的崇敬由来已久，并且观赏了他在美国发行的影片。戴尔·德拉姆自1952年以来定期与德莱叶通信，当该报纸提醒人们，其实没有关于德莱叶的英语著作，而且其他语言的著作也寥

寥无几时，我们决定承担起这项任务，以一部英语的卡尔·德莱叶传记来填补电影史上的空白。

我们与卡尔·德莱叶的通信始自他接掌哥本哈根的达格玛影院不久。他希望有个信息来源，向他介绍美国最新上映的影片，提供事实、背景和观点，以供他遴选影片在达格玛上映。他向电影史学家西奥多·哈夫提及了这一期望，于是哈夫请求戴尔·德拉姆担任卡尔·德莱叶在美国的情报员。持续十五年之久的令人欣喜的通信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卡尔·德莱叶的英文很漂亮（他总是自己打字）。除了信件之外，我们每年还能收到别出心裁的圣诞礼物。有一年是安徒生童话的精美版本，几本关于丹麦的图文并茂的书；有一年是《伊甸园以东》的某个场景的加长版（他对詹姆斯·迪恩印象极其深刻）；还有一年是以我们的名义在以色列的丹麦林种下的几棵树。来自美国的信件显然对他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在信中推荐了《卡门·琼斯》，该片在达格玛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帮助它树立了战后哥本哈根最负盛名的影院的声誉。

有这一重通信关系作为背景，我们感到自己拥有了写作我们所期望的那类书籍所必不可少的与卡尔·德莱叶的联系，我们向他提出建议，他立刻欣然应允。

下一个步骤起初令我们有所动摇，尽管我们相信，这是绝对必要的，即，学习丹麦语。我们带着几分胆怯投入了学习，在艾尔斯·弗里多夫松的热情帮助下，最终完成了我们本来心存疑虑，认为绝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我们的采访绝大多数是以英文进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阅读丹麦文的话，丹麦电影博物馆收集的大量剪报资料，就会一无用处了。本书所有的非英语材料，除非另有标注，都是由我们自己翻译的。1967年2月，我们到达了丹麦，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我们在丹麦电影博物馆工作，采访卡尔·德莱叶和其他相关人士，探访有望找到的影片拍摄地点，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卡尔·德莱叶和丹麦。从各方面而言，这些经历都令我们获益匪浅。

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卡尔·德莱叶本人谈话的机会。我们总共做了八次访谈，每一次都持续三到四个小时。在这些访谈中，卡尔·德莱叶毫不踌躇地主动提供信息并回答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觉得戴尔·德拉姆作为大学教授的身份给他以信心，确保本书会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他所谓的“廉价的心理分析货色”。他对此非常介意，因为他相信电影和他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的严肃性。我们确信卡尔·德莱叶与我们谈话比他跟其他依然在世的人谈话要随意得多，我们视这种信任为特权。

丹麦电影博物馆尽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礼遇和帮助。馆长伊布·蒙蒂任由我们使用图书馆的所有资料，并安排放映卡尔·德莱叶的全部影片，这是评价他整个电影生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此外，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在剪辑台上拉片子，以分析单个的场景和画面。本书中来自卡尔·德莱叶影片的插图因此几乎全部取自影片本身，而不是工作照。

向读者提供洗印的影片剧照，自然不及工作照细节清晰，对比强烈，但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符合读者需求的。工作照通常提供的是没有在影片中实际出现的场景，而且，既然它们几乎都不是出自影片的导演之手，实际上无法体现影片的真意。对于《诺言》和《格特鲁德》两片，卡尔·德莱叶坚持亲自指导工作照的拍摄——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行为——因此就这两部影片而言，使用工作照是合理的。亚努斯·巴弗德，博物馆工作照主管，一直保持无穷无尽的热忱和耐心，为我们冲洗一批又一批的照片，安排印制我们需要的剧照，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挚友。

无须怀疑，在有关卡尔·德莱叶的资料收藏中，丹麦电影博物馆馆藏的大量剪报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不过，收集的资料势必众寡不均。《格特鲁德》资料颇丰，包括卡尔·德莱叶和其他人在制作过程中的访谈，自卡尔·德莱叶宣布要摄制这部影片起的批评与评论。同样，也有记录了《诺言》摄制的每一步骤的文章、图片、采访和花絮。

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影片资料则相对匮乏。博物馆建于二战结束之后，此前资料的保存工作是由个人或者电影公司来承担的，后来才移交给博物馆，因此这些资料难免缺损或遗失。而且，在并不重视传播与大众媒体的昔日，报纸与杂志也不会大量刊登关于电影的消息，至少在好莱坞之外是如此。因此，我们像所有传记作者一样，沿着时间回溯时，会发现资料的数量在减少，而人们在追忆四十或五十年前的事情时，不管他们多么希望有所帮助，其记忆也会恍惚淡化，或者自相矛盾。

除了卡尔·德莱叶本人，我们也曾以种种方式与之合作的人会面，他们态度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埃里斯·皮奥、本特·罗特和埃纳尔·费德斯皮尔，以及所有曾出演过卡尔·德莱叶的影片的人，都期望与我们分享与卡尔·

德莱叶共事的回忆。我们也感谢另外两个给我们来信并提供帮助的演员：奥拉夫·乌辛和埃纳尔·西塞纳。亨宁·本特森，《诺言》和《格特鲁德》的摄影师，与我们共度了一个漫长的下午与晚上，为我们介绍了卡尔·德莱叶影片摄制方式的全貌。摩根斯·斯各特-汉森，拉特纳电影公司的总裁，卡尔·德莱叶多年的好友，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伊迪丝·奥特曼-尼尔森，腓特烈堡图书馆的馆员，在卡尔·德莱叶前来图书馆为自己各个拍摄计划查找书籍时结识了卡尔·德莱叶。卡尔·德莱叶会为其影片（不论摄制与否）的背景做大量的研究，他首先要去的图书馆就是位于他在达尔加斯大道的寓所附近的腓特烈堡图书馆。在这些年间，她帮助他为摄制基督生平的影片而查找有关巴勒斯坦的书籍，为设想中的美狄亚的影片而查找有关希腊的书籍，并逐渐与他及其家人熟悉起来，而她友好地与我们分享了这些经历。

卡尔·德莱叶亲自把我们引见给了卡伊·蒙克的遗孀利塞·蒙克。卡伊·蒙克是《诺言》的作者，也是丹麦抵抗纳粹的英雄。我们前往了日德兰半岛西岸的韦泽瑟，蒙克一家曾经居于此地，卡伊·蒙克在此向他小小的团体宣讲自由，并因此而被德国人杀害。蒙克夫人及其家人每个夏天都要返回此地居住一段时间，她热情地引领我们参观那一地区。卡尔·德莱叶于1954年前来韦泽瑟拍摄《诺言》，蒙克夫人也向我们讲述她与卡尔·德莱叶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共事的经历。

卡伊·蒙克的五个子女中有两人在我们探访期间也在韦泽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我们与蒙克一家的交往以及他们对卡尔·德莱叶的印象，对于理解卡尔·德莱叶最成功的影片，也是他最爱的一部影片的背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卡尔·德莱叶作为导演，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家制片公司是丹麦的北欧公司和帕拉迪昂公司。它们对我们也无私襄助，特别向我们开放了工作照的档案。北欧公司的O. 贝里森和帕拉迪昂公司的弗兰克·伦德，还有塔格·尼尔森，帕拉迪昂公司的前任总裁，为我们提供了只有卡尔·德莱叶的至交密友才可能提供的大量信息和帮助。

照片的另一个来源是哥本哈根两份主要的报纸：《贝林时报》和《政治报》。卡尔·德莱叶在做新闻记者的岁月里与之联系紧密。《贝林时报》的晚间版《B. T.》和《政治报》的晚间版《号外报》的电影栏目编辑，对我们

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

我们发现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资料慷慨地任由学者使用，我们为在那里受到的礼遇而心存感激。1970年夏天，在跟随友好的格蕾特·哈特柳斯学习了丹麦语之后，我们重返丹麦，逗留了一个月，从而得以观看在复活节期间上映的一部电视片，内容是关于卡尔·德莱叶筹划多年的讲述基督生平的影片。

丹麦电台的拉尔斯·格拉夫·尼尔森对卡尔·德莱叶的电影资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经过一番出色的侦查，他在以色列发现了十箱珍藏的资料。他将其带回丹麦，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尽可能地再现卡尔·德莱叶头脑中对于基督生平的叙述。尼尔森安排了节目的放映，借给我们一份在以色列发现的资料内容的完备目录，为我们复印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带回家，并赠予我们电视片的剧本。

雷奥·菲舍尔，卡尔·德莱叶多年的律师，对于寻找卡尔·德莱叶在以色列的资料最尽心的人之一，拨冗向我们慷慨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丹麦之外，我们还访问了卡尔·德莱叶工作过的其他国家。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孤本”的照片，玛丽·米尔森算得上是最可爱的东道主。斯德哥尔摩的电影历史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卡尔·德莱叶在瑞典拍摄影片《两个人》时的有趣照片，其馆长尼尔斯-雨果·盖博尔一直有求必应。北欧电影学院则向我们开放了卡尔·德莱叶早期在挪威拍摄影片的资料。

在奥斯陆，通过尼尔斯·布赖斯坦因的帮助，我们拜见了他的父亲伊拉斯谟·布赖斯坦因。在退休前，伊拉斯谟·布赖斯坦因曾是一名活跃的挪威导演。他那愉快而翔实的回忆使我们获益匪浅。也是在奥斯陆，卡尔·德莱叶在巴黎时的朋友，雕刻家埃米尔·利，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们讲述拍摄《圣女贞德的受难》时的卡尔·德莱叶以及当时他与卡尔·德莱叶的友谊。我们也有幸查阅了伦敦的英国电影学院的档案。

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艾琳·鲍泽，以及洛杉矶的唐纳德·戴施纳、阿瑟·奈特和马文·沃德，曾给予我们帮助与鼓励，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戴尔·D. 德拉姆一病不起，本书的手稿一直搁置到1998年才有了出版的机会。琼·德拉姆对之加以修订，并重访丹麦，研究丹麦电影博物馆

（如今是丹麦电影学院的一部分）的资料，自我们于 1970 年最后一次探访后，其资料又有所增加。在卡尔·德莱叶研究室工作是一种乐趣，谨向该处慷慨提供帮助的友好的工作人员致以无尽的谢意。身为研究者，不可能有更高的期望了。当然还应该特别向伊布·蒙蒂和亚努斯·巴弗德致谢，感谢他们宝贵的帮助与鼓励。这是美好的经历。

目录

前 言 001

引 言 外和内刚 001

第 一 章 哥本哈根的童年 004

第 二 章 新闻记者和飞行员 018

第 三 章 学艺 033

第 四 章 去国 068

第 五 章 进一步实验 087

第 六 章 初尝胜果 102

第 七 章 伟大与悲剧 111

第 八 章 卡尔·德莱叶制片公司 132

第 九 章 间歇 146

第 十 章 两部影片 162

第十一章 大材“小”用 182

第十二章 《诺言》 197

第十三章 最后一部电影 221

第十四章 梦想的终结 243

影片目录 274

参考文献 296

索 引 299

引言

外和内刚

1967年我们抵达丹麦开始本计划数周后，德莱叶说他可以带我们去路易斯安那，这是一个优雅迷人的艺术博物馆，就坐落在哥本哈根以北的海岸上。博物馆在举办一个大型的德莱叶展映，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崇敬与关注。卡尔·德莱叶陪伴着我们，我们立即被引导着进入了博物馆，甚至没有动一下买票的念头，我们三人在展厅中漫步，德莱叶轻声解说我们看到的展品。毫无疑问他乐在其中。片刻后，他说他累了，打算坐一会儿，但是敦促我们去观看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我们继续在照片和纪念品中徜徉，在某一处位置上，我们的目光越过房间，瞥了一眼安静地坐在长椅上的德莱叶。房间里挤满了参观博物馆的人，他们来来往往，兴致勃勃地观看每一件展品，但是没人注意到那个坐在长椅上的不起眼的老人就是德莱叶，他羞怯地坐在人群之中。我们被这种不协调打动了，观察了一会儿，正是在此时，我们领悟了卡尔·德莱叶生活与工作的一个本质特点：他内在的谦逊，几乎是羞涩，以及他是如何地不愿引起对他个人的关注。

我们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研读有关他的一切，并且与所有人谈论他，所以我们明白，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诚然，他安静、羞怯、虚心、谦卑。他对自己偶遇及共事的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他从不咄咄逼人，从不疾言厉色地坚持己见，但是在执导电影时，他的另外一个维度就凸显出来了。当然，并非截然不同。他依然彬彬有礼，轻声细语，但是一切，绝对是一切，都要彻底遵从卡尔·德莱叶的意愿。当他执导影片时，他不会安静地坐在背景中的长椅上。

有一个曾与他共事的人惊讶于他是如此地谦逊而又如此地自负。在工作时他的确有这种自负，虽然他未必会称之为自负。他会称之为信念，来自孜

孜不倦的前期准备，也来自于他的胸有成竹，不仅仅是因为他，卡尔·德莱叶，想这么做，也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承认他追求完美，但这是因为，没有完美就没有最好的影片。他知道对于他的影片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他带着一个传教士拯救误入歧途的灵魂时燃烧般的热情来追求这种无可置疑的正确。

于是所有的制片人、演员、摄影师、布景设计师和剧作家都会遵照卡尔·德莱叶的期望而行事。这是洗脑，有人这样说。但他是平静地、礼貌地做到这一切的。你是否介意在面对摄影机时脸部略微侧一点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们在这里布一点儿光，刚刚触及左臂。他总是考虑得很全面，在头脑中计划得很周到，只是一个特别的摄影机角度，只是一个道具的准确的摆放位置，从不疾言厉色，从不显得是在提要求，尽管他的确是在提要求。永远是他的布景，他的剧本，他的演员，他的影片，一位同事说，但是他有某种德莱叶式的魔法，让这一切都轻描淡写地发生，在所有人还不曾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多年以来，德莱叶赢得了拍摄现场苛刻的监工的名声，他的要求不近人情，把演员逼得暴跳如雷、泣不成声，甚至精神崩溃。那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了解他，矢口否认这一指控。他是个迷人的合作伙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我乐于跟他再次合作。当然，他也许会在凌晨两三点钟给他们打电话。你好，我是德莱叶。我在琢磨最后那个场景。你觉得你可否这样而不是那样移动吗？哦，我吵醒你了吗？真对不起。我没意识到有这么晚了。不，不，拍摄《愤怒之日》时，我们去吃午餐，让安娜·斯维耶基耶继续捆在梯子上。这样等我们重新开始拍摄时能够增加她的痛苦的真实程度。哦，是的，这很不舒服，她说，但是影片效果太好了。勒妮·法尔康内蒂必须为拍摄3 《圣女贞德的受难》而把头发剃光。她泪如泉涌，但没有退缩。他拥有绝对意志，与他共事的人都不愿意敷衍了事或降格以求。

而且要求都伴随着：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这样试一下，非常感谢，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点咖啡吧。他令人难以抗拒。

当然，有时候这种方法并不奏效。制片人和投资商在面对卡尔·德莱叶时经常感到不舒服。他坚持自己有权决定影片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一心一意地追求尽善尽美，顽固地（当然，也是礼貌地）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无

助于鼓励人们投资于他的影片。由于人们认为他是个稍微有些危险的暴君，甚至疯子，他拍摄影片的机会大大减少了。的确，他曾想拍摄更多的影片，多得多的影片。他拍摄影片的计划层出不穷，但影片必须成功，必须达到他的标准，否则他宁可不拍摄。这是一个远大的志向，在远大的志向背后却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品位和热忱经营着哥本哈根最负盛名的影院，但《诺言》在达格玛首映时，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宁可让他的秘书为王室献花；他骄傲地保存着《诺言》为他赢得的奖品，但摘掉了上面的识别标志，这样没人能够看出这些是什么东西。

他的生命跨越了电影的诞生与发展。Levende billeder，“活动影像”，在最初的日子里，丹麦人这样称呼电影。德莱叶有幸看到了北欧公司拍摄的北极熊的图像在早期的银幕上不规则地抖动。十二年后，北欧公司有了摄影棚，为热情的观众拍摄画面充斥着动作的单部电影。在一战前丹麦默片的繁荣岁月里德莱叶成为一名编剧。战后电影变成了大型行业，在美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的成功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莱叶彻底离开了新闻界，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电影的拍摄，在瑞典、德国和法国，在默片的黄金时代，以一部经典之作《圣女贞德的受难》而一举成名。然后有声片的时代降临了，默片的许多明星没有在新技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德莱叶似乎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蹉跎了十年，无法找到资金来支持他拍摄电影。难于共事，吹毛求疵，默片时代的导演，这样的谣传不胫而走。他挺了过来，制作了三部有声片，证明自己不仅是影像的大师，也是声音的大师。他唯一不曾涉足的技术是色彩，他对于拍摄彩色片有的是计划。无须说，他头脑中的彩色片和此前看过的任何彩色片都会大异其趣。它们会是卡尔·德莱叶与众不同的视像的一部分。

这个礼貌的暴君，这位谦逊的导演，这位虚心的完美主义者在两代电影人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位准备工作一丝不苟的幻想家的事业覆盖了从镍币影院到即时点播的时间跨度。如果能够目睹他在 21 世纪会做什么，该有多大的乐趣啊。

第一章

哥本哈根的童年

5 在丹麦，卡尔·西奥多·德莱叶不仅被公认为伟大的电影导演，也是丹麦最伟大的电影创作者，其艺术核心似乎牢固地植根于丹麦的文化与风土。不过，德莱叶成为丹麦人纯属偶然，因为他的祖先本在瑞典南部，与丹麦隔着松德海峡遥遥相望。

 尽管不必当真认为遗传在德莱叶的影片中显现出了可见的影响，但他的出身以及童年的经历却无疑不容忽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告诉笔者，“我会给你们讲几件事，这会说明许多问题。”本书所充分论述的“许多问题”就始自“几件事”，并且受其左右。不过，在他讲述的几件童年往事中，德莱叶实在称不上坦率。也许他对于自己的出身和父辈并不了解，但确定无疑的是，他对许多他了如指掌的事实也讳莫如深。只有在他以及他家庭的许多成员去世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探索他的家世背景。

 德莱叶的母亲名叫约瑟菲娜·伯恩哈尔迪内·尼尔松，1855年生于罗伊格，距离海斯勒霍尔姆不远，后者是瑞典南部斯科纳地区的一个商业城镇，与丹麦只隔着松德海峡。她的父亲，佩尔·尼尔松在当地的政府中任职（职务可能大致相当于治安法官），并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农场。约瑟菲娜的母亲，奥利娃·奥尔森，是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丹麦女人。尼尔松夫妇生育了十二个子女，但只有五个长大成人。约瑟菲娜作为幸存下来的长女，无疑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了代理母亲的角色。

6 约瑟菲娜曾就读于当地的学校，但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没有学习生意或者技能。她想必是待在家里，帮助料理了几年家务，因为直到1879年，她二十四岁时，才离开家，在卡尔斯洛庄园找到了一个女管家的职位，这是离海斯勒霍尔姆不远的格兰汀格的一所大庄园。与其他的仆人相比，她在这户

人家中的地位令她属于“较高的阶层”，但当然没有到达中上阶层，一个对她而言高攀不上的位置。九年后，她还待在那里，依然未婚。在那个时代，婚姻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一步，人们难免要猜测她为什么依然保持单身。她的一张照片——卡尔·德莱叶终生把这张照片小心地放在自己案头——显示出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浓密而有光泽的头发编成发辫盘在头顶，高高耸起，目光坚定地直视着相机镜头。

卡尔斯洛的主人是一个丹麦人，他们家族在哥本哈根经营着欣欣向荣的羊毛和亚麻生意。兄长继承了生意，身为幼子的延斯·托尔普则买下了卡尔斯洛，移居瑞典，成为地主和马场主。他买下卡尔斯洛不久，约瑟菲娜就在那里工作了。托尔普能够找到这样的女管家可能倍感幸运。她习惯于管理家务，而且拜她的丹麦母亲所赐，她能够讲丹麦语。既然托尔普不讲瑞典语，这绝对是个有利因素。约瑟菲娜定居在了卡尔斯洛。

然后在1888年6月，约瑟菲娜怀孕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她的家人，从未透露过孩子生父的身份。芒坦·德鲁齐在他撰写的德莱叶传记中，声称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并提出了精心收集并分析的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间接的，并且由于年深月久，根本无从查证。我们所知的就是，1889年1月中旬，她前往哥本哈根，寄居在一位通过招收付费的寄宿客人来增加收入的寡妇家中。就在那里，斯托姆街5号，卡尔·西奥多·德莱叶于1889年2月3日出生。

德鲁齐指出，一个在哥本哈根举目无亲的年轻女人在私人家里寄宿而不是去医院很不同寻常，而其他想离开家中秘密生产的年轻女人通常都会选择医院。既然延斯·托尔普在哥本哈根的家就在附近，德鲁齐暗示，假设延斯·托尔普安排了这一切，并支付了费用，也是合情合理的，尽管他没有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之所以猜测延斯·托尔普是德莱叶的生父，这也可以算是一条佐证。

约瑟菲娜很快就为孩子找到了养父养母，然后返回卡尔斯洛，继续她的工作。她的去职及其原因似乎不成其问题。这是否也证明了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呢？

最初的养父母没有资格监护儿童，于是这个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丹麦的有关当局试图寻找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丹麦的纳税人没有义务来承

担负养育瑞典孩子的费用。不过，约瑟菲娜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登记为她的家乡的瑞典城镇的名字拼写错了，所以无法确定她的住处。于是他们前往哥本哈根的托尔普家打听消息。这似乎的确说明了托尔普家族与约瑟菲娜的孩子有牵连，但是，也许未必如德鲁齐所认为的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或者他们仅仅是想帮助一个得力的雇员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直到那时仍对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的约瑟菲娜，飞快地赶到了哥本哈根。她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一个绝望的母亲希望好心人收养一个漂亮小男孩，孩子的父亲去了美国”¹。德莱叶告诉笔者的“几件事”之一就是他的父亲跑掉了，他微笑着说，“去了美国，所有的坏人都去那里”²。有趣的是，约瑟菲娜的一个弟弟也确实移民去了内布拉斯加州，他在那里活到将近一百岁的高龄。

1978年，德莱叶的儿子埃里克给德鲁齐打电话。他从姐姐那里听说德鲁齐打算写一本有关他父亲的传记，正在收集资料。德鲁齐说，埃里克“被我的好奇心激怒了”，要求他放弃写作这本书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要对任何有关他父亲身世背景的资料守口如瓶。当埃贝·内高在1950年为德莱叶撰写简短的传记时，德莱叶已经向内高讲述了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一切，这些应该足够了。德鲁齐回答说，关于德莱叶身世的更多资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埃里克听了更担心了。

最后他告诉德鲁齐，他自己对于父亲的家世也很好奇，曾想过联系瑞典马尔摩的有关当局。在着手这件事之前，他与母亲谈论了一下自己的计划。她告诉了德莱叶，希望德莱叶亲自给儿子讲一下自己的祖辈。不过，德莱叶对此的反应与常人大相径庭，他立即给埃里克写信，告诉埃里克切不可这样做。德莱叶的家庭这一话题是个人隐私，是他与他妻子之间的秘密，不应该再外传。在这种情况下，埃里克告诉德鲁齐，他也应该尊重这个秘密。埃里克说，关于他父亲的家庭，他只知道，约瑟菲娜是一名仆人，被农场的主人欺骗了。

婴儿德莱叶，此时由哥本哈根市政登记处登记为“卡尔·尼尔松”Karl Nielsen（他妈妈姓氏的丹麦拼法），后来被一个姓彼得森的家庭收养。父亲是街车售票员，住在哥本哈根北郊几乎要进入乡间的地方。彼得森一家似乎打算把卡尔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育并收养他，但他们在1890年8月改变了主

意，原因不得而知。于是约瑟菲娜第三次前往哥本哈根。她在报纸上又刊登了一份广告：“一个可怜的姑娘恳求好心人收养一个可爱的、发育良好的一岁九个月的小男孩，因为她无力抚养他。”³ 回应这份广告的是卡尔·西奥多·德莱叶，一个印刷工，以及他的妻子，英格·玛丽。

1890年10月30日，约瑟菲娜·尼尔松——她留下的地址为卡尔斯洛——放弃了自己身为这个孩子母亲的权利，再一次声称孩子的父亲在美国，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同意给这个孩子冠以德莱叶这个姓氏。然后，约瑟菲娜回到了瑞典。她又一次怀孕了。

跟上次一样，关于第二个孩子的父亲，人们依然一无所知。德鲁齐猜测这次她希望与孩子的父亲成婚，而他认为与地位显赫的延斯·托尔普结婚则是不可能的。他这样说的理由是，她的这次怀孕延续了七个月。不过，此时，她已经断定孩子的父亲不会娶她，于是她试图流产。1891年1月，她吞下了从火柴上刮下的大量的磷。火柴在瑞典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家庭用品。她显然听说过这东西会造成流产，却不会对她造成任何损害，只不过有些恶心。然而，事与愿违，病了六天之后，她死去了。她的死被认为“非自然死亡”，瑞典有关当局进行了解剖。死因被认定为磷中毒，她怀孕的事实被注明。既然她告诉医生她吞服磷只是为了流产而不是意图自杀，教会允许她在她家附近斯托比教堂的墓地下葬。她的讣告刊登在1891年1月23日的《海斯勒霍尔姆时报》上，声称她的家人和亲友深切地哀悼并且怀念她。

我们无从得知德莱叶对于他母亲的不幸遭遇究竟了解多少，尽管他对于埃里克的好奇心的反应表明他可能一清二楚，并且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约瑟菲娜死亡的事实在瑞典载于公共记录之中，任何人均可查阅。他曾经查阅过吗？我们无法确知。约瑟菲娜的家人也知道事实，后来德莱叶曾与他母亲的家人有过联系，所以他很可能询问过，或者他们主动告诉了他。我们也同样无从得知他是怎样、在何时得到了她的相片。显然是在他长大成人并且离开了德莱叶家之后，因此可能是在他前往瑞典拜访自己的亲戚期间。据德莱叶说，她的家人从未对她有过一句苛责，总是说她的好话。“就我所闻，她是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⁴

德莱叶一家也知道约瑟菲娜的死讯。他们显然指望从她那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作为收养这个孩子的协议的一部分。既然她死于收养文件生效的一个